



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

编委会主任 谢伏瞻 总主编 赵剑英

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

The Study of World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A Reexamination

(1949-2019)

于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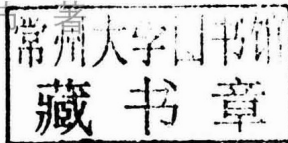
编委会主任 谢伏瞻 总主编 赵剑英

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

The Study of World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A Reexamination

(1949-2019)

于 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 / 于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12
(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
ISBN 978 - 7 - 5203 - 5162 - 1

I. ①当… II. ①于… III. ①世界史—史学史—学科
发展—研究报告—中国—1949 - 2019 IV. ①K091 -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1020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耿晓明
责任校对 万文华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9
字 数 600 千字
定 价 2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谢伏瞻

副主任 蔡 昉 高 翔 高培勇 姜 辉 赵 奇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马 援	王延中	王建朗	王 巍
邢广程	刘丹青	刘跃进	李 扬	李国强
李培林	李景源	汪朝光	张宇燕	张海鹏
陈众议	陈星灿	陈 甦	卓新平	周 弘
房 宁	赵 奇	赵剑英	郝时远	姜 辉
夏春涛	高培勇	高 翔	黄群慧	彭 卫
朝戈金	景天魁	谢伏瞻	蔡 昉	魏长宝

总主编 赵剑英

书写当代中国学术史,加快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谢伏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修订出版《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对于推动我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大论断和战略任务。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考量,关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长远发展,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是重大的学术任务,更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学术自觉,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和担当精神,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上有过硬的举

* 谢伏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措、实质性进展和更大作为。《丛书》即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具体措施之一。

研究学术思想史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之一。学术思想历来被视为探寻思想变革、社会走向的风向标。正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所言,“学术思想与历史上之大势,其关系常密切。”“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覘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我国古代研究学术思想史注重“融合”“会通”,对学术辨识与提炼能力有特殊要求,是专家之学,在这方面有大成就者如刘向、刘歆、朱熹、黄宗羲等皆为硕学通儒。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逐渐发展起来,学术思想史研究亦以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发轫,以章炳麟、钱穆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用现代学术视角“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开始将学术思想史研究与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结合起来,形成了不少有影响的名品佳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更加凸显,在研究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取得新突破。但是,我国当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没有跟上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步伐,呈现出“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公认的学术思想史大家屈指可数。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学

术思想史研究和出版工作,系统梳理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总结各学科积累的优秀成果,既是对学术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弥补当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不足,也将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早在建院之初的1978年,胡乔木同志主持的《1978—198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初稿)》就提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伦理思想史”等近10种“学术思想史”的规划。“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初版于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予以修订再版,充分体现出我院作为“国家队”的担当。《丛书》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思想史演进中的脉络梳理与关键问题分析为主要内容,集中展现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创建、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思想史的历程,突出反映7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成就与经验,资辅当代、存鉴后人,具有较强的学术示范意义。

学术思想史研究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学科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依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已拥有20多个一级学科、400多个二级学科,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不健全、不系统、

不完善，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学科体系建设的前提是对各学科做出科学准确的评估，翔实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天然具备这一功能。《丛书》以“反映学科最新动态，准确把握学科前沿，引领学科发展方向”为宗旨，系统总结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美学、宗教学、法学等学科70年的学术发展历程。其中既有对基础学科、重点学科学术思想史的系统梳理，如《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等；又有对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冷门学科学术思想史的开拓性研究，如《当代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当代中国边疆研究》《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等。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系统评价各学科的发展，对于健全学科体系、优化学科布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学术思想史研究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学术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理念、原理、观点、理论、学说、知识、学术等；二是研究方法、材料和工具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只有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才能着力打造“原版”“新版”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创新是有前提的，正如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创新离不开学术思想史研究，只有通过坚实的学术思想史研

究,把握学术演进的脉络、传统、流变,才能够提出新问题、新思想,形成新的学术方向,这是《丛书》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创新作出的贡献之一。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材料与工具自成体系,具有构建学术体系的各项特征。《丛书》通过对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创新,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一是观点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我国思想界发生了大规模、深层次的学术变革,70年间中国学术已经形成了崭新格局。《丛书》紧扣“当代中国”这一主题,突破“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思想束缚,独辟蹊径、勇于探索,聚焦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学术发展、中国传统学术继承和外来学术思想借鉴,民族复兴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反映等问题,从而产生一系列的观点创新。

二是研究范式创新。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和历史叙事,是由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的一系列概念和逻辑构成的。当代中国学术的源流、变化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变革密切相关。《丛书》把研究中国特色学术道路的起点、进程与方向作为自觉意识,贯穿于全丛书,注重学术思想史与中国学术道路的密切联系、学理化研究与中国现实问题的密切联系、个别问题研究与学术整体格局的密切联系、研究当代中国与启示中国未来的密切联系,开拓了学术诠释中国道路的新范式。

三是体例创新。《丛书》将专题形式和编年形式相互补充与融合，充分体现了学术创新的开放性，为开创学术思想史书写新范式探路。对于当代学术思想史研究，创新之路刚刚开始，随着《丛书》种类的增多，创新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思路还会更多，更深入。

学术思想史研究为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有特定思想指向和价值取向的语言系统，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话语体系时，要坚持中国立场、注重中国特色，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要主动设置议题，勇于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丛书》定位于对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的独家诠释，内容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学术，具有学术“走出去”、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扩大我国学术思想影响力、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条件。《丛书》通过生动的叙述风格传播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全面、集中、系统地反映我国当代学术的建构过程，让世界认识“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的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丛书》通过对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描绘，让世界了解中国特色的学术发展之路，进而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丛书》中的《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当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等已经翻译成英文、德文等多种语言,分别在有关国家出版发行,为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国际化传播开拓了新路。

目前,《丛书》完成了出版计划的一部分,未来要继续作好《丛书》出版工作。关键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特别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学术思想史研究和出版工作。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作好《丛书》出版工作必须坚持以质量为生命线。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多出精品力作。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要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秉承认真负责的治学态度,严肃对待学术研究,潜心研究,讲究学术诚信,拿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都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号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思想自觉,敢于担当,奋发有为,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

播中国思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是为序。

2019年10月

代 序

中国世界史学者的社会责任*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世界历史研究最深刻的变化，是在其发展历程中，实现了从翻译、编译，以及一般性地介绍向深入、系统、独立研究的转变，“世界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完全具备了任何一门科学学科所具有的科学形态，以及不可或缺的理论和方法。世界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研究队伍的成长、壮大，以及一系列标志性的成果问世，其地位和影响日渐扩大。当然，这是就世界历史整体学科的状况而言的。今天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无论在通史、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还是在专门史、历史人物、历史文献的研究上，都可谓硕果累累；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前无古人”，“史无前例”。党的十七大报告论述“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时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①。这使广大世界史工作者不仅深受鼓舞，更深感责任重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使世界史研究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我们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出明确的回答。

* 《中国世界史学者的社会责任》，曾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0 年第 6 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第 32 卷，第 3 期，收入本书为《代序》时，作了一些修改。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3 页。

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是重视对外国历史的研究。司马迁《史记》，分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五类，计130卷。有关外国的介绍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列传”中，如《大宛传》《匈奴传》等，包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大宛、乌孙、康居、燕蔡、大月氏、安息等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是司马迁历史思想的核心。而要达此目的，也需要对中国以外地区的了解。只不过当时的某些“外国”，现在早已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在当时并没有在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史记》以下的二十五史，除了《陈书》《北齐书》之外，其他二十三种史书中，都涉及了对外国的介绍和研究，各代官修纪传体史书中都有“外国传记”，包括东南亚、中亚、西南亚、欧洲和西非许多重要的地区和国家的。

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萌生，始于19世纪中叶，这和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联系在一起。中国先进分子为拯救民族危机“睁眼看世界”，林则徐编译《四洲志》、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影响下，中国世界史研究从“萌生”开始逐渐发展，力图通过外国“亡国史”“革命史”“建国史”的研究，寻找中国独立、自由、解放的道路。辛亥革命期间，美国《独立宣言》（当时译为《美国独立檄文》或《美利坚民主国独立文》）曾五次在《国民报》《民国报》等报刊全文发表，绝非偶然。20世纪初，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对中国史学，特别是对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深远影响。1920年，李大钊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一文中，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强调“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②除李大钊外，中国共产党

^① 《汉书》卷62《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② 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见李大钊《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344页。

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李达、瞿秋白、恽代英等，也开始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在唯物史观理论的指导下，人们对“改造世界”的理性认识，有了新的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抽象的“学术”。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特点是与时代的脉搏同时跳动，它研究方向的主流，从不曾脱离时代的主题。中国世界史研究萌生时期即表现出的特点。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继续发扬光大，并不断赋予其新的社会意义和时代内容。

1980年，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的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进入迅速发展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全面恢复；北京大学等高校历史系开始设立世界历史专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始招收世界史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国家级的《世界历史》杂志创刊，在国内外公开发行；10余个全国性的世界史研究会（国别史和专门史）相继成立；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世界史组，开始接受世界历史科研项目的申报和评审；等等。然而，这一切令人鼓舞的事实，并没有解决一个更为迫切、更为直接的现实问题，即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继承发扬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优秀传统，自觉坚持世界史研究的方向问题。“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造成的严重思想混乱，要真正做到“拨乱反正”尚需要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不等于这条路线就可以一帆风顺地贯彻落实了。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学术思潮，包括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鱼目混珠，大量介绍到国内来，一时不少奇谈怪论充斥其间，有人甚至公开鼓吹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出路，是“国际化”，是“价值中立”，是“全盘西化”等，所有这些都使得“方向”问题越发重要。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世界历史研究如何体现出它的社会责任尤其重要。为名利而研究，还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研究，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基本立场问题。世界史或其他学科研究的主、客体有其特定的内容和规范，但这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并不相悖。世界历史研究的社会责任，从根本上要落

实在“二为”方针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历史研究的成果令世人瞩目,但毋庸讳言,在前进的道路上仍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少数人仰承洋人的鼻息,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西方的史学理论,生吞活剥,盲目崇拜,甚至主张放弃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去与西方“接轨”,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受制于人,丧失起码的学术尊严和民族自信心。这与我们所说的有选择地汲取外国史学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当前,社会上的浮躁风气和商业上的投机心理侵蚀着学术,世界历史研究也不是在真空之中,如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假冒伪劣、抄袭剽窃;热衷炒作、拉拉扯扯,无原则地吹捧;等等,而信仰、理想、使命等,却被抛到九霄云外。凡此种种,都是没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的具体表现。学术研究是一项严肃、艰苦而又崇高的工作,研究人员要自觉地承担起社会责任。我国的世界历史研究要发展,有许多事情要做,但首先要加强研究人员的社会责任感,要牢记学术研究的目的,不为名利所惑。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能力和成果,是国家文化力量的重要标志和体现,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充分认识广大世界史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在今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联系到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现实,笔者以为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世界史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其一,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统领世界史研究,重视对世界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在充分实现世界史研究的科学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同时,服务大局,自觉地坚持“二为”方向。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世界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吴于廑、齐世荣在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和《世界通史》时,曾探讨过这个问题,目前,世界史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正不断深化。

吴于廑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漫长过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

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① 吴于廑关于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世界历史概念并逐渐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与交往的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②。马克思强调：“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③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今天我们理解“全球史观”的理论基础。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相继出版了齐世荣总主编的4卷本《世界史》。这部著作的《前言》写道：“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区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几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几种社会形态。它们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但不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历史都无一例外地按照这个序列向前发展。有的没有经历过某一阶段，有的长期停顿在某一阶段。总的说来，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尽管先后不一，形式各异，但这个纵向发展的总过程仍然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④ 当前，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化的主要标志，是将理论上的探析，同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的研究结合起来，使人们不仅从理论上，而且通过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实际过程，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真谛。

其二，理论联系实际，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努力做到深刻的理论探究与高度地关注现实的辩证统一。中国世界史研究历史感与现实感并重的优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④ 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当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